

静静沉没的大师

——怀念陈培勋老师

鲍元恺

(一)

1957年我进音乐学院附中，正逢17岁的高班同学刘诗昆在匈牙利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获奖归来不久。学校各种对内对外音乐会，都会安排他的独奏节目。他演奏的曲目，除了以此获得特别奖而得到李斯特一缕头发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之外，总要有首淳朴亲切的《卖杂货》，作为“狂想曲”辉煌炫技后的小憩。此后，我又不断听到这首曲子以及另外三首钢琴曲：《旱天雷》《思春》和《双飞蝴蝶变奏曲》。我从这四首钢琴曲知道了陈培勋，但对于我这个初中生，这只是节目单和乐谱上的一个作曲家的名字。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从七纬路附中到十二经路“院部”大院，“处处《卖杂货》，天天《旱天雷》”。我找来这四首谱子，在钢琴上反复揣摩。那充满浓郁广东风情的旋律，那色彩丰富的和声，那精致独特的织体，令我着迷，令我赞叹。

7年后的1964年9月，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配器课，任课老师正是我仰慕多年的陈培勋教授。此时，我已经是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学生。遗憾的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我们的正常教学被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不断搅乱。

开始一个月，我们配器课虽然受到当时禁止使用“封、资、修”教材的限制，但课堂教学大体还能正常进行。到10月，音乐学院按照北京市委要求，全院到通县参加农村“‘四清’大会战”，全部课程都中断了。在“四清”中，音乐学院和北京市法院、制药厂以及焦化厂的“四清”工作组混编。所幸，音乐学院只有我们师生俩分在一组，这样，我和陈老师同组工作、同室居住、同桌就餐达八个月。

我们参加四清的地方在北京通县六合大队疃里生产队（今通州区宋庄镇疃里村）。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我和陈老师就在这里参加“四清”。起初他负责会议记录，我负责青年工作，后来一起参加村史的写作。1965年初，从邻村调来作曲系的同学张以达，又逢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李纯一和吴钊参加后期四清，也都在疃里加入到我们这个村史写作组。陈老师负责的那一部分，由于语法修辞欠佳，最后都由杨荫浏先生修订文字、誊写蜡纸、油印完成。记得村史是倒叙，陈先生用了几百字啰啰嗦嗦地写四清开始前的准备。到杨先生手里，开头只用八个字“兵分两路，准备四清”，便一目了然且具对仗趣味。陈老师自知不擅中文写作，看罢只能自惭地呵呵一笑。

一对作曲师生朝夕相处，话题自然还是作曲。我们

睡觉在社员家，“派饭”在社员家。那时是人民公社制，农民被称为“社员”。我们“四清工作队”统一安排到社员家吃饭——交钱交粮票，每天换一家。在北方农村暖炕上的睡前闲聊，在炕桌旁盘着腿，就着高粱面饼和棒渣粥的“餐叙”，成了无形课堂。被中断的课，就这样在政治运动喧嚣中默默地继续着。陈老师教给我的经验、招数，远远多于禁锢下的学校课堂。连续八个月的“私人授课”——“老柴”、“老肖”、拉威尔……铜管组的均衡、木管组的交叉、音色的横向布局、层次的递增递减……，对于我这个有乐队演奏经历，又背过大量总谱的学生，先生的点拨往往心有灵犀——尽管我们不可能带去总谱，更没有唱片。

1965年5月，四清结束，我们班又被安排到农村“开门办学”。学生们住在香山卧佛寺和万安公墓东北的太舟坞大队（现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村）。陈老师每周坐长途汽车到这里，继续着被“四清”打断的配器课。但是，他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教学，公开印出来的教学谱例完全改成了《长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符合“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标准的作品。当然，他使用这些谱例，不完全是当作范例。“这一段如果把小提琴去掉，只留下中提琴，悲伤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和弦当中的圆号，如果1、3同度，2、4同度，会比分成四个声部音响更饱满。”对谱例的这些修正意见，在我们的课上经常会听到。有趣的是，他给我们留的配器作业因为不必公开，则全部是西方的钢琴曲，与公开油印的教材谱例完全不是一回事。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第八奏鸣曲第二乐章，格里格《挪威舞曲》、肖邦《A大调波兰舞曲》、柴科夫斯基《一月》《四月》、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月光》。这些，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为钢琴谱配器的“看家”习题。

1966年6月初，先生绞尽脑汁在夹缝中生存的配器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彻底结束了。

(二)

陈培勋1922年出生在香港，祖籍广西合浦。原名陈宏秀，英文名是Chan Pui Feng。儿时读的是英文学校，因此英文流利熟练，中文却难免捉襟见肘，这严重阻碍了他的中文写作，致使他一生没有出版过一部教材，是为憾事。

陈培勋的音乐创作，始于抗战期间。1941年，陈培勋在香港居民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弹钢琴。香港、广州相继失守后，服务团撤离到曲江，此后在这里成立了广东艺专。陈培勋的第一部作品，舞剧音乐《宝塔与牌坊》，就是在这里为舞蹈教学弹钢琴时，应吴晓邦先生和梁伦先生之约创作的。那时，曲江只有两台钢琴，一台在基督教青年会，马思聪当时就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另一台是艺专从地方教会买来的。舞剧首演，就是陈培勋在这架钢琴上演奏他的音乐的。

1943年，陈培勋到了重庆，在马国亮领导，马思聪、郑志声、林声翕等先后担任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低音提琴手，也兼任过定音鼓手。他曾在课上说过，很多作品的总谱，就是担任乐团乐手的时候背下的。为了生活，他还曾在舞厅做过钢琴手，即兴演奏是他的绝活儿，还弹的一手相当地道的爵士乐。他和另一位音乐家卓明理，在重庆是当时有名的“洋琴鬼”。

在重庆期间，因为中华交响乐团的乐手多在育才学校兼课，陈培勋结识了在育才主管教务的李凌先生。这位十几年后担任中央乐团团长的广东老乡，给予陈老师很多切实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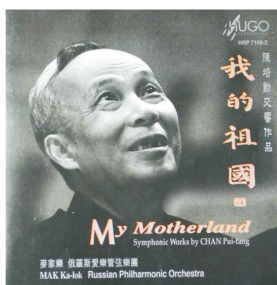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陈老师即到音乐学院任教。他担任的第一门课不是管弦乐配器，而是“军乐配器”——他认为，只有雄壮激昂的军乐，才能表现革命的激情和军队的步伐。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怀着对新政权的热切希望和对革命者的衷心崇敬，在军乐配器的教学上乐此不疲。他在军队里的朋友，大都是军乐团骨干，是他当年的学生。

不久后，苏联专家古洛夫和阿拉波夫相继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和配器。配器班上，陈老师成绩突出，他和施咏康、苏夏的作业经常被当作示范教学的范例。这一阶段，他缩写过大量总谱，其中最多的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苏夏先生看过他写的“柴六”缩谱，每组乐器的分配，八度、同度的重复，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后来，吴祖强和杜鸣心从苏联留学归来，带回了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和声、配器习题连带老师的批改记录。这些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陈老师也从中吸取了配器教学的许多经验，承袭了许多习题。

陈老师多方面的音乐实践和丰厚的艺术积累，为他的创作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年代初，陈培勋（左一）热衷于“军乐”。这是他和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军乐学员在一起



（三）

1978年，陈培勋根据广东音乐《平湖秋月》创作了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同名钢琴曲，与前四首合为《广东乐曲五首》出版。这些乐曲始终是很多音乐会和钢琴比赛的保留曲目，后来还出现在朗朗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节目单和他录制的唱片《黄河之子》中。这五首乐曲，是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巅峰级文献。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先生以合法手续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在浸会学院艺术教育系任教。原本排挤他的人，此时又以此找到了攻击他的新借口。中央乐团计划中的陈培勋作品音乐会，也因一纸指责他“叛国”的书面报告而取消。此悖理伤道之举，令这位充满爱国情怀的艺术家晚年不胜伤感，难以释怀。

1995年，香港雨果公司出版的陈培勋交响音乐专辑唱片《我的祖国》。其中包含了陈培勋的三部交响乐代表作。这些作品，充满爱国情怀和对革命领袖的崇敬：

交响诗《心潮逐浪高》；

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I 前奏曲《咏雪》；II 英雄的诗篇《娄山关》；III 叙事曲《追怀，展望与前途》；

第二交响乐《清明祭》：三段连续演奏的单乐章交响曲，I 烈士碑前；II 忠魂舞；III 遗愿化宏图。

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写于1960至1964年间，初名《江山如此多娇》，文革期间总谱遗失。1976年重写第一和第二乐章，1989年增写第三乐章并更名为《我的祖国》。这部交响曲磅礴恢弘且不失细腻深沉。第二乐章《娄山关》曾以《从头越》之名作为单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30周年创作一等奖。

第二交响乐《清明祭》，作于1980年，献给文化大革命中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们。同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优秀奖。1993年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的内容皆来自1976年4月5日那场风暴的《天安门诗抄》：（一）“初春寒意浓，哀思涌心中。丹心映山红，碧血染旗红”；（二）“悲风平地起，狂飙从天落。英雄别故土，肝胆照山河”；（三）“巍巍青山耸，铮铮松柏葱。遗愿震人寰，壮志贯长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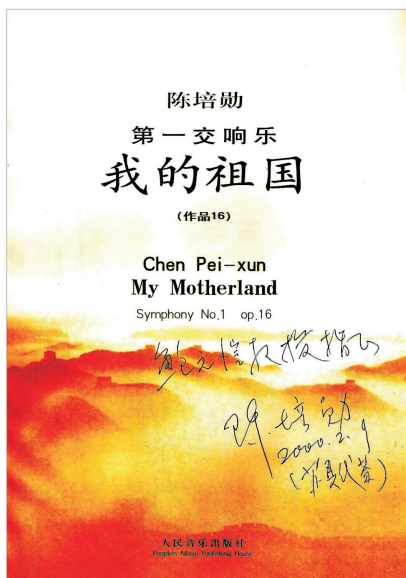
他在文革中遗失的第一交响乐的手稿，在文革过后的1978年失而复得。那是当时刚刚留校任教的于京君（现著名旅澳作曲家）在一次打扫卫生时，从一堆垃圾中拣到的。于京君回忆：“那是一个纸包，里面都是铅笔写的没有署名的总谱，有《咏梅》《娄山关》。捡到谱子后我留了几天，欣赏它的精美。一次，作曲系开会，我拿给系里几位老师看，李西安老师一眼就认出来了，赶忙把坐在远处的陈培勋请过来，说：你今天要请客啊！你先答应，再告诉你为什么。陈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听说遗失的总谱找到了，他高兴得大笑起来。”

文革中，文物、手稿、艺术品，被毁坏或丢失不计其数，失而复得者微乎其微。陈老师是幸运的。

陈老师到香港定居后，我们的联系很少。但是他每有新的总谱或唱片出版，总要托苏夏老师送给我。

这个时期，陈老师创作了许多在中国内地鲜为人知的音乐作品：

小交响曲《迎春》：I 抒情的前奏曲《迎春》；II 交响舞曲之一《红梅》；III 间奏曲——两首云南民歌；IV 交响舞曲之二《春节庆会》，1982年）；



1998年6月，中国交响乐团举行我和杨立青、金湘的作品音乐会。那天，他由苏夏老师搀扶着到北京音乐厅。因中风而说话吃力的陈老师对我说：我们就是来听你的作品的。

1999年，我到南线阁寓所看望中风的陈老师，他的言语和行动已经出现严重障碍。这是我和这位敬爱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

（四）

2007年9月上旬，我在天津参加中国合唱创作发展论坛。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的苏夏老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陈老师走了。从苏夏先生那里知道，陈老师的最后时刻是在深圳海滨广场福田阁的寓所度过的。而他去世的消息不是他的后人通知母校的，而是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工作的校友常静仪老师通知中央音乐学院的。

之后我又从梁茂春教授那里得知了陈老师忌日。梁教授根据音乐学院宿舍楼张贴过的一张简单讣告，确定陈师离世的时间是2月25日。

陈老师的去世，没有见到任何公开报导。转年年初，我在《人民音乐》发表了一篇悼念陈培勋老师的文章。这是唯一的在官方媒体上发表的祭文。

阿镗先生在得知陈老师离世的消息后，来信对我说：“大约七年前，我请香港雨果唱片公司的易有伍先生，帮我约了陈培勋教授见面。本来希望做一个深入、专业的访谈。可惜陈教授已中风，所谈多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无法进入我原先设定的话题。雨果为他出版的《我的祖国》CD，管弦乐配器效果之佳，音乐之耐听，华人作曲家中罕有其匹。以专业论，他胜过同时代比他更有名气，更有地位的不少人。除了鲍爷，希望有他的其他弟子也来写点纪念他文字。”

陈老师的老朋友，当时已90高龄黄飞立先生告诉我，陈培勋的逝世，他是从黄安伦的越洋电话中知道消息的。而远在加拿大的黄安伦又是从我在网络上发布的

高胡协奏曲《广东音乐主题》（1983年）；

乐队与合唱《儿童节序曲》（与叶惠康合作，1984年）；

小交响曲《青年》（1986年）。

这些作品，充满了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热爱。

1996年，雨果唱片公司录制了他的管弦乐《欢乐的春江花月夜》。

消息中知道的。黄先生说：像陈培勋这样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这样杰出贡献的人，难道不应当隆重地纪念他、宣传他，让大家学习他吗？

黄飞立先生的公子，作曲家黄安伦在给我的信中说：“在同代的先辈里，特别是其奇美壮丽的和声与配器，陈培勋无疑是第一位！晚生我不仅是弹他那《卖杂货》长大的，迷上作曲后得近水楼台之便，更得到他不少一生有益的教诲，永志不忘！对大师的遗产，吾辈真应当坐下潜心钻研。这两天家父（大师的老哥们）指挥的葬礼进行曲在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原来因此损耗。因时代关系，他的儿子受教育有限，对身边的天才老爹毫无认识，令人扼腕！”

事后，作为陈老师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中央音乐学院，确实想过为纪念陈先生做些应做的事。王次炤、唐建平、黄旭东曾分别代表院、系和音乐教育促进会，希望我参与母校搜集整理陈先生遗作的工作。但无奈于陈先生后人对此配合不利，我们得不到必须的资料。由此，我想到了江定仙后人江自生、江桥，夏之秋后人夏兰青、郑凯林、夏三多，杨儒怀之子杨小春，郑律成之女郑小提，陈田鹤之女陈晖，许勇三之女许霭春，莫五平的夫人李淑琴……由于他们的尽心竭力，使这些故去的作曲家生平得以完备和出版，作品得以演出和传播，精神得以弘扬和传承。

一个本应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钢琴和管弦乐两方面的创作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培养了几代作曲家的艺术大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默默离去了。

比我高一班同学胡海林，至今保存着他在陈老师课上的作业：根据德彪西的钢琴曲《沉没的教堂》配器的三管乐队总谱。先生离世后，胡海林痛呼：陈先生如那座教堂，静静地沉没了……



2000年，鲍元恺的老师们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40周年校庆活动中。
左起：陈培勋、苏夏、赵润、陈宗群、杨儒怀